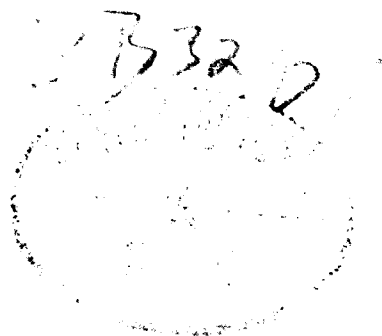




科工要字第802 2 0008663 4 0137125

先秦军事研究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 编
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室



金盾出版社

序 言

一九八八年十月，在古都西安召开的先秦军事史学术讨论会，收到学术论文三十八篇，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和后勤学院学术部的几位同志编辑成《先秦军事研究》文集，委托金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个文集收入的论文，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属于军事思想方面的九篇；二、属于国防建设及军队改革发展方面的也是九篇；三、属于战略、策略和指挥艺术方面的十篇；四、属于军事后勤及军队装备方面的七篇；五、其它三篇。这些论文，绝大多数内容翔实，文字严谨，只有个别文章稍嫌单薄，但也有一定的学术性、理论性和可读性。

我认为这个文集的出版价值主要在于：一、在论文的内容上，突出了对繁花似锦的春秋、战国军事问题的研究，同时也适当兼顾到整个先秦时期同军事直接有关的政治、经济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研究先秦军事问题，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二、有些论文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为当前的国防建设和军队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三、过去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在这个文集中，有的同志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数学方法，将春秋、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的强弱情况编制成动态模型，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尝试，可以使我们在今后的历史研究中，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更好地结合起来，取得更大的科研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相当丰富，其中有些理论具有古朴的唯物主义辩证观点，至今仍为各国政界人士奉

为经典,并运用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中。至于把《孙子》等兵书用于企业经营与竞争的国家就更多了。我们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先秦的兵书,更是素有研究,深得要旨,善于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在战争年代,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汲取古代军事理论的精华,结合不同的作战对象和主客观条件,采取机动灵活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新中国成立后,又高人一筹地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历次边界反击作战与平息内乱的胜利。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建军、建国中,也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中国历史上建国、建军及作战的大量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思想上的“上下同欲”,就不可能有行动上的“步调一致”,从而也就难以取得重大决策的成功与胜利。因此,我们军事历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国历史上有关建国、建军及作战的大量历史经验和理论精华,结合当前的实际需要与可能,介绍给广大读者,使人们从了解中华文化的美好过去中,看到美好的未来,认识到炎黄子孙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促进“上下同欲”和“步调一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国和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作出新的贡献。同时希望有更多同志参加我们的行列,为弘扬中华文化,清除《河殇》之类的奴才气,加强国家和军队建设作出更大、更有成效的贡献。

刘鲁民

一九八九年“八·一”

建军节前夕 于北京

序

去年10月，在古都西安召开了中国先秦军事史首届学术讨论会，五十余名专家、学者“以文赴会”，切磋学问，考镜源流，佳文颇多。大家希冀早日结集面世。在总后编审办主任刘鲁民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经编辑小组的努力，于今年6月，《先秦军事研究》编选成集。我有幸先期阅读一过，并应邀在前面写几句话，感慨颇多，约略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是军事发达之国，军事史的研究逐渐引起有识之士重视，这是很令人欣喜的。先秦军事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文集的出版即是一例。中国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军事实践非常丰富，军事史料非常丰富，军事论著非常丰富。已有一些专业机构和军事史学爱好者，从事较系统研究和著述。据不完全了解，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历代战略研究室正在编写系列性专著《中国军事通史》；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战史；军事百科研究部有历代军事著作、军事人物、著名战争战役等众多条目的编撰；后勤学院编写历代后勤史；军事博物馆增建历代战争馆；有些同志还编写了军事专题史著作等。地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史学教学和研究中也增加了军事史方面的内容，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上更为突出，被称为史学研究中“五朵金花”之一；国家教育委员会约请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编写《中国军事简史》作为高校文科生读本；有些军队院校也开设了军事史课程。军队系统有《军事历史研究》（空军政治学院编）、《军事历史》（军科军史部编）、《军事史林》（军事博物馆编）等刊物，许多地方刊物中军事史文章也有一定的发稿率，等等。但是，军事历史研究就整体而言，就其地位和作用而言，就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研究而言，还是不够的。至今还没有将军事历史作

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起来。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

二、军事史是综合性学科，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地理等诸多方面。就军事史内容来说，包含战争、国防建设、军制、军事后勤、武器装备、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军事外交、军事地理、军事人物等许多侧面，它们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相互间的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构成有机整体。军事史研究是很艰难的，有其特殊性，对研究人员的学术素养要求较高。除了基本理论素养外，还要求在史学方面和军事方面具有广博、深厚的专业知识。军队和地方都有一些既懂史学，又懂军事的人才，但更多的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前一阶段军事史研究中，军地的史学研究者各展其长，而未能很好地有效合作。这次《先秦军事研究》可说是在先秦军事史领域军地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晶。这也为双方取长补短进一步合作研究创造一个良好条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

三、先秦军事史是中国军事史起始和重要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更是军事发展的“黄金时期”。仅就军事思想说，绚烂多彩，美不胜收。外国称我们为“兵法之国”，兵法中代表作有一批就产生在这一时期，如《孙子》、《吴子》、《孙臆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尤其是《孙子》名扬中外，影响深广。古人说“以史为鉴”。从军事史中汲取智慧是将军们的信条。这本论文集探讨、总结先秦军事诸多方面的经验，对我军干部来说也有借鉴之效。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谢国良

一九八九年六月

目 录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富国强兵思想	刘鲁民(1)
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变革	陈恩林(7)
先秦军队发展探析	王辉强(20)
孙臆的军队建设理论及其实践	杨善群(32)
论赵武灵王军事改革之历史条件	新生禾(41)
中国古代战争起源新探	姚 政(54)
先秦兵家论将才的选用	杨国勇(66)
春秋战国时期各主要国家动态模型初探	周勇烈(73)
富国强兵必须坚持改革	臧士明 钟克亮(80)
我国先秦时期后勤体制的探讨	陈孝文(87)
夏商时代军事后勤问题探讨	孟世凯(95)
先秦耕战思想初探	刘 庆(107)
《孙子》的后勤思想	齐振军(115)
奇特的军事纪念碑 诗式的后勤启示录	
..... 陈少华 张大庆(120)	
《六韬》的军事后勤思想	秦 勇(126)
考古所见战国齐兵器种类及有关问题	
..... 杜 宇 孙敬明(130)	
略论先秦时期兵种的变化及武器装备的发展	
..... 何贤武(140)	
秦在七国争雄中的战略问题	顾孟武(148)

析秦统一中国战略实施之步骤与策略	于汝波(159)
远交近攻探真	文士丹(171)
试析先秦军事思想中的战略威慑理论	贺久如(181)
浅论合纵连横中的联合作战思想	张华强(187)
论春秋战国时期遏制战争的思想	黄志贤(193)
《周易》的军事思想	房立中(195)
论《左传》军事观的二重性	张丽荣(206)
论早期儒家的战争观念	吕绍纲(217)
早期儒家军事思想基本特征试探	黄朴民(228)
试论先秦齐国的兵学渊源	田旭东 王子今(239)
孔子军事思想试探	柯远扬(250)
《易经·师卦》所反映的先秦军事决策	张 文(258)
略论孙子的领导决策思想	杨丙安(265)
论《管子》的军事思想	袁德金(274)
《墨子》防御思想初探	于泽民(285)
《尉繚子》军事理论概述	徐 勇(294)
《吕氏春秋》军事思想初探	刘春志(304)
先秦战争中气象学心理学知识的应用及特殊战法	史延庭(313)
先秦长城简考	蒋至静(321)
白起的军事艺术	褚良才(328)
先秦兵书研究之我见	许保林(335)
后记	本书编辑组(346)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富国强兵思想

刘鲁民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两个划时代性的社会变革：一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二是由分封割据向集中统一的过渡。在这两大变革中，涌现出许多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管仲、商鞅、孙武、吴起等人。他们都以富国强兵思想作指导，为各自的君主和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这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以及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仍有可借鉴之处。为此现将五点管窥之见，简介和论述如下：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

《司马法·仁本第一》讲“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先秦的《吴子·图国第一》中还列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好战与忘战的后果：一是“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二是“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古今中外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讲，德、日、意三国的失败是由于好战；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被日军偷袭，苏联在德军的闪击下初战失利，则是疏于戒备，也可以说是由于忘战。

用兵是有关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除非别无他途，是不能轻易言战的。孙武在其兵法《谋攻篇》中明确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但是，“兵者，诡道也。”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①。所以，又必须“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② 这就是说，做到“有备”，方可“无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长期处于大战未起，小战不已的相对和平环境。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美苏两国的核武器越来越多，已经到了战则同归于尽的地步，以致双方都不敢冒大战的风险。近年来，就连中、小战争和军备竞赛也难以随心所欲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承受不了沉重的军费负担；另一方面日本和西欧经济的发展，动摇了美苏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霸主地位，不得不谋求裁军与缓和，以利发展经济，巩固各自的既得利益。一些地区霸权主义，不仅未从战争中捞到太大的便宜，反而加重了本国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动乱，也不得 not 有所收敛。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实际情况，决定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中转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同时又确定保留一定数量的常备军，维持必要的战备动员能力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自卫作战能力，这体现了一不好战，二不忘战的国防建设思想，是符合当前实际需要与可能的英明决策。

富民强国，寓兵于民

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主要是由于采取了富民强国，寓兵于民的政策。《管子·治国》中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陵上

① 《孙子·计篇》。

② 《孙子·形篇》。

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七法》中告诉我们：“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未出境而无敌者八。”为什么把“聚财”、“论工”、“制器”放在“八无敌”的首位呢？因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难以养兵、练兵和用兵；没有发达的军事生产，就难以有充足的优良装备，建设强大的国防。管仲还采取了“作内政以寓军令”的特殊政策。将行政组织与军队编制融为一体。当时，他将齐国划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免除兵役，专务本业，生产与贩运军队装备及人民生活用品等。士农十五乡，平时务农习武，战时应征参战。士农各乡按轨、里、连、乡的系统组成，同时也就是军队编制的伍、小戎、卒、旅。五家为轨，每家出一士卒，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编五十人为小戎，由里司率领；四里为一连，共编二百人，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共编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编一万人为军。十五乡共编三军，分别由桓公、高子、国子统帅。因为士卒同一邻里，所以“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这就是中国古代寓兵于农的农战政策。现在时代变了，不可照搬先秦的农战政策，但是这种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却值得借鉴和发扬。

采取什么政策才能使人民富有呢？先秦时期主要有两条办法：“一要除害兴利”。西门豹治邺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他一方面整治为“河伯娶妇”的坏分子，为民除害；一方面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二要“轻徭薄赋”。《管子》中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亡。”所以孙武提出“役不再

籍，粮不二载”的原则。吴起在楚则革除世袭贵族的特权，精减国家机构，节省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商鞅深知“谷贱伤农”的道理，认为“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主张：“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达到了民富、国强的目的。管仲不仅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也兼顾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鼓励人民各守本业，讲求生产技术，努力发展经济；同时还强调蓄积，以备军需，没有战争则以蓄积扶贫。总之就是要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同时又力求减少国家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古代如此，现在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古代讲的强本、固本专指农业，现在应把基础工业和科研教育也加上。至于商业，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它作为“末业”来抑制，虽然有利于“固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社会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过分限制了商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处在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中，就更不能没有发达的商业了。但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路子却走不得。

因势利导，改革创新

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社会变革，是当时的大趋势。有些政治家、军事家采取了因势利导，改革创新的富国强兵方针，从而取得了成功。例如：管仲在政治和军事上，针对强国众多的形势，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针，合强以攻弱；在经济上则“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在国防建设上则采取富国强兵、寓兵于民的政策，使齐国取得了霸主地位。商鞅在秦的变法，吴起在楚的新政，也都是顺乎潮流的重大改革，因而取得了富国强兵的重大成果。时代前进了，事物发展了，形势改变了，为政之道也必须改变。处于社会大变革中尤其如此。正如商鞅所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①。今天我们在治国建军上，就更要因势利导，改革创新了。

知人任贤，择善而从

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著书立说，到处游说，希望得到各国君主的重用，以展其才，遂其志。作为君主来讲，能不能尊重人才，择善而从，择贤而用，就十分重要了。孙武以兵书十三篇得到吴王的重用，取得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的重大成功。吴起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理论，得到魏文侯的赏识，“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②。秦国不仅重用本国的人才，而且任用各国流亡或游说来的人才（客卿），从而取得了富国强兵，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的丰功伟绩。至于赵国被白起坑士卒四十余万，燕国在连续攻战齐城七十余座的情况下，反而以失败告终，则都是由于用蠢才代替了英才。宋襄公以小国争霸的失策和泓水之战的失败，则是由于不听从目夷和子鱼两位公子的劝说所致。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出谋划策固然很重要，决策与用人就更重要了。

上下同意，齐心协力

孙武在其兵法《计篇》中，讲了用兵前就可知胜负的五件大事和七个关键情节。居首位的就是“道”，即是“主孰有道”。这里讲的“道”是什么含义呢？孙武告诉我们：“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吴王阖闾在政治上比较英明，做到

① 《史记·商君列传》。

② 《吴子·吴起初见魏文侯》。

了“有道”，所以能立于强国之林；吴王夫差反其道而行，则杀身亡国。

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中的改革创新者，都是靠“上下同意”，齐心协力才成功的。例如：齐国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秦国的废井田，开阡陌，魏国的兴修水利，赵国的胡服骑射，楚国的废除贵族特权等改革创新，离开了“上下同意”是难以成功的。现在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同样也需要“上下同意”，齐心协力的改革创新。今后，要全面深入改革，就更需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从军队来讲，只有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才能达到先富国而后强兵的目的。

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变革

陈恩林

春秋是我国奴隶社会由盛到衰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奴隶制度“礼崩乐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周代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笔者认为,周代的军事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周代兵制的基本形式是“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兵役划分为现役和预备役两级。

(2)周代兵源的特点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实质上是自由民当兵,奴隶不当兵。

(3)周代的兵役制度与军赋相结合,当兵者纳军赋,不当兵者不纳军赋而纳税。

(4)周代军事领导体制是一元化的,其军队组织又是多元化的,各诸侯国都有数量不等的地方军队。

(5)周代的禁卫军具有常备军性质,由王官组成,是一支贵族军,人数不多,这并不影响其军事制度的民兵性质。^①

但是,周代军事制度的这些基本特点,在春秋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变化。

一、西周建立的军事领导体制瓦解,军权不断下移

① 参见拙著《论周代军事制度的几个特点》《吉大学术论文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丛书,第42辑。

西周时期，周代国家的最高军事权力掌握在周天子手中，周天子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最高的祭司，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周王室拥有“西六师”和“殷八师”两支大军，而列国诸侯大者三师、二师，小者一师，由此建立起了一套“本大末小”的军事体制，各级军队皆听凭周天子调动，是所谓“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①周天子依靠王室军队能有效地控制诸侯，能畅行无阻地“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②这就造成了西周政治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③的大一统局面。

但是，春秋时期，由于宗周覆灭，王室军队瓦解，周天子的最高军事权力连同他所建立的一元化军事领导体制一道付诸东流。周代军事权力普遍落入了国家第二级统治者诸侯手中。这时列国间的征伐、盟会已皆由诸侯自专，不再受天子控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让位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军权下移的第一个后果是列国扩军。春秋伊始，郑国和楚国就打破了西周“诸侯一师”的限制，组建了三军。楚在成王时又建立了“申、息之师”^④，后又建立了“许、叶之师”^⑤，到楚灵王时，“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⑥，楚的总兵力已达六七千乘之多。齐在桓公时，管仲也采取“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方法，把军队扩编为“三军”^⑦。晋国扩军的速度，堪与楚国媲美，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 678

① 《国语·鲁语上》。

② 《国语·周语上》。

③ 《论语·季氏》。

④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⑤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⑥ 《左传》昭公十二年。

⑦ 《国语·齐语》。

年),晋仅组建一军,十几年后即作“二军”^①,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为创建霸业,作了三军,转年他又“作三行”,把军队扩大到“六军”。当时,其他国家,如秦穆公有军队“三万人”^②,据《文献通考》说这三万人就是“三军”。宋有“三军”,吴王僚也有“三军”。吴的三军在夫差时发展到了“四军”。楚有“三军”,其兵力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约为5万人左右。鲁在襄公时也是一度“作三军”。到春秋晚期,甚至连小小的微国邾,竟也有兵车“六百乘”^③,几乎可与春秋初的大国相埒。

军权下移的第二个结果是大国争霸。周东迁以后,天子失权,王纲解纽,周代政治出现了权力真空,所以列国相继扩军备战,互相兼并,籍以夺取号令天下的地位,大国争霸的方伯政治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不论是春秋前期的齐桓、晋文、楚庄王,还是春秋后期的吴王阖庐、越王勾践,其霸业都是由军权下移引起的。

周代的军权下移,基本原因在于它所实行的分封制度。所以,王权的衰落是同列国封君的膨胀同步进行的。由于周代奴隶制度衰落的总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王权的衰落,君权衰落的日子也就来临了,而君权的衰落又是与列国内部的封君——卿大夫家族势力的膨胀同步进行了。

列国军权下移的过程,大体上始于春秋中期。日益频繁的战争为统率军队出征的卿大夫攫取军权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晋灵公年幼继位,大夫赵盾出任中军帅,执掌国政。他杀了政敌续简伯,驱逐了狐射姑,牢牢地控制了军权。从此晋国军权旁落到卿大夫手中,中军将执掌国政成为惯例。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晋景公为奖赏鞍之战有功人员,

① 《左传》闵公元年。

② 《吴子兵法·图国》。

③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昭公三十年,哀公十一年,哀公七年。

竟“作六军”，使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雅、赵旃六位大夫都当上了卿，分享到部分军权。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 559 年），晋悼公因为“新军无帅”，人选不好定，干脆取消了新军。这都充分说明晋国的军权实际上掌握在强大的卿族手中，连军队的设置都不是为着国防，而是因人而设，是权力的再分配。在鲁昭公时代，晋国表面上还维持着大国的威风，能在平丘大会上出动兵车“四千乘”^①，向诸侯炫耀武力，但其内部已被卿族蛀空，“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侈”^②，公室军队竟然“公乘无人，卒列无长”^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后，晋国发生了历时 7 年的大火并，智、赵、韩、魏 4 家消灭了范氏、中行氏，接着赵、魏、韩 3 家又消灭了智氏，完全控制并瓜分了晋国的军队，从而造成了 3 家分晋的格局。

鲁襄公十九年（公元前 554 年），齐大夫崔杼借灵公病重之机，拥立庄公为国君，一举夺取齐国军政大权。自此以后，齐“崔、庆愈强而齐国大家几尽矣”^④。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48 年），崔杼杀齐庄公，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546 年），庆封灭崔氏。次年，齐陈、鲍、栾、商 4 家联手攻灭庆氏，控制并瓜分齐国军政大权。鲁昭公十年（公元前 532 年），陈、鲍两家又攻灭栾、高氏，陈氏并同时取得齐的大邑高唐为采地，势力更加强大，逐步独揽了齐国军事大权。到这时候，连齐景公及其大夫晏婴都预料陈氏将代齐，说陈氏“有施于民”，“民归之矣”^⑤。

春秋中期以后，其他华夏国家的军权也渐次落入卿大夫手中。如郑国的军权掌握在七穆手中，所以子驷杀郑僖公竟如儿戏一般。

① 《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③ 《左传》昭公六年。

④ 《左传》昭三年。

⑤ 《左传》昭公三年。